

第一章 序言：篇章语言学与篇章语用学

文化符号学的创始人 Peirce 在一百年前就十分重视符号使用的作用。他在 Eco 的影响下潜心建设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并确定其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为“符号”([英] sign)、“对象”([英] object)和“解释者”([英] interpretant)。符号从 Eco 和 Peirce 开始就不被认为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解释的对象，并始终脱离不开符号使用的行为场景。在此基础之上，符号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理论和元语言学。^① 另一位对当代符号学作出巨大贡献者 Morris 把符号学看作是对所有学科具有指导意义的学科，因为任何学科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因而符号学是元科学，提供了一种普通语言，是可以运用到任何场景的一种特定的语言符号。Morris 提出了与 Peirce 相符的符号学三分法：意义、规则和使用，并于 1938 年在他的《语用学》(*Pragmatics*)一书中把语用学这个学科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关系的学科。篇章语言学在初具规模不久之后，便按照符号学和普通语言学基本研究领域的划分，也把篇章语法、篇章语义学和篇章语用学确定为三个主要分支，并且把篇章与篇章使用者的相关部分归入篇章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所以，“篇章语用学”这个概念本来就作为篇章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② 在近期的篇章语言学研究，言语行为、交际场景等则已发展成为篇章研究的主要方面，例如 van Dijk 提出把建立在言语行为基础之上的超结构作为与语义宏观结构并列的第二套篇章总体结构。^③ 与此平行出现的另一趋势是，语用学的最新研究逐渐由孤立的单句转向篇章，并可以说因此而参考和吸收

参见 Schalk 2000, 74。

参见 Sowinski 1983, 64—79; Weinrich 1976, 11—18

参见 van Dijk 1980。

了篇章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例如德国篇章语言学家 Harweg 考察论证的篇章表层连接手段——替代形式被英国的语用学家 Levinson 作为指示形式[英] deixis, [德] Deixis 的一种形式——话语指示形式[英] discourse deixis, [德] Diskursdeixis)。^①

本书取名为“篇章语用学概论”，首先是基于语用学和篇章语言学两个领域中近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实质性发展：1) 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脱离语境的孤立的句子，而以超越句子层面的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2) 篇章语言学不再只探讨篇章内部的语言现象，而是将篇章之外的人以及人使用语言时的场景条件纳入观察和描写的视野。正像 Brown/Yule 所说，话语分析犹如语用学，关注的是使用语言的人正在做什么，说明的是话语中的哪些特征体现出完成这些行为的手段。正因为话语分析是研究使用中的语言，所以它必然采用语用学的研究方法。

其次，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篇章语言学实质上已与语用学融合成为篇章语用学，与哲学中本体论的转向有极大的关系。“纵观本体论演变的历史，可以说在本体参照系、时空存在的形式、必然与自由等方面实现了以下四个转向：1) 由传统实在的自然绝对本体论转向人类生命本体（即由客观世界转向人的生命世界）；2) 由恒定不变的存在（上帝、自然）转向人的感性生成（过程、时间）；3) 由无时间的大全转向时空之中的过程；4) 由客体论必然转向主体论（自由）。本体论的转向集中反映了现代人自身价值的变化：一方面是‘有之为有’的对象式追溯方式消解为‘人化’的主体感性存在方式，另一方面是对象（世界存在时间、空间）的本体地位为人的主体（感性、生命活力）所取代，并由整体主义越来越向个体主义过渡。然后，对象（时空）又内化为人的认识的参照系，使得本体论的转变又暗含着认识论上的重大转变，即认识论不应再是关于如何把握自然实在（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如何领会人自身的学说。

^① 参见 Levinson 1983/1990, 87—99。

参见布朗/尤尔 1983/1988, 27, 28。

认识论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确定不变的复现和认识，而是具有了明显的‘生命—历史相对主义’的色彩：真理、价值、意义不是绝对不变地放在那里任人去拿，而是需要人根据自己的生命力来设定，需要人去孜孜追求和加以确立的。”^①

将各种人类活动作为一种本体看待的哲学观不仅把人融入本体之中，而且也逐步把作为活动主体的人放在中心位置。因此，在篇章语言学的领域里，人本体从后台走上语言本体研究的前台也就不是例外的现象。如果说语言交际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作为语言使用方式的篇章就既是交际活动的基本手段，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手段。人类的各种社会性活动通过篇章得以协调和实施，心理过程能够得以表达和被理解。在此意义之上，不仅篇章本身作为一个物质性的实体而存在，而且交际参与者生成和理解篇章的机制和过程对参与和组织社会活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两个领域之间不仅有衔接重合的部分，而且在性质上也有共同之处。正如许国璋先生指出：音系学、语法学和语义学是语言的静态描写；语用学和篇章分析是对语言的动态描写。^② 这个共同的性质使本书中论述的篇章语用学必须采用以动态过程为取向的基本方法。

就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在本书中将把作为篇章生产者、接受者和场景的构成要素放到与篇章同等的地位来分析和描写，而这些构成要素在很多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中常常被作为背景参数。这是因为我们将把侧重点移到探讨篇章、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上。正如 Humboldt 所言：“语言研究除了语言使用本身外，还要说明人、一般世界、尤其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每个民族之间的类似性。”^③ 我们的假设是，这三者会形成三种交叉关系：1) 以篇章为

参见王岳川 1997, 23。

② 参见许国璋 1997, 5。

③ 参见洪堡特 1985/1997, 4。

中心的关系：人←篇章→世界；2) 以人为中心的关系：篇章←人→世界；3) 以世界为中心的关系：人←世界→篇章。在本书中我们将试以阐明：这三种关系分别在什么状态下生效，哪种关系在篇章语用学的框架中起关键作用。

我们在本书中赋予篇章语用学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秉承其他篇章语言学理论的共同宗旨，将培养和提高语言使用者生成和理解篇章的能力作为己任，使少数人无意识的天赋能够得到理论上的归纳、总结，并且传授给其他人，以此提高学习者的篇章意识，更好地指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我们相信，以篇章和篇章使用者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篇章语用学将能更好地胜任这个使命。

1. 篇章语言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前景

不管是把篇章语用学看作是跟篇章语法和篇章语义学平行的一个学科分支，还是认为它在篇章语言学中已占主导地位，并在未来甚至可能在实质上成为篇章语言学的总框架，我们都无法无视篇章语用学与篇章语言学的直系亲缘关系。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仍把篇章语用学看作篇章语言学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比较恰当的。因此，要系统论述篇章语用学的来龙去脉和整个轮廓，以及阐明它在篇章语言学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和前景，应首先回眸篇章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篇章语言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欧美产生，在 70 年代逐渐形成，是继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之后新兴起的一个语言学分支。除了荷兰的语言学家 van Dijk 鉴于篇章语言学跨学科的性质曾努力把这个学术领域提升到“话语科学”的高度外，^①一般情况下篇章语言学仍被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篇章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从结构和功能来研究篇章，这既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

^① 参见 van Dijk 1980。

的目的地，同时也是篇章语言学与许多语言学分支形成交叉，但绝不能相互取代的根本原因。从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来看，篇章语言学属于宏观语言学领域。它与属于微观语言学的种种语言理论之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孤立的单句的框架，将视野扩展到实际交际活动中连贯的言语的广阔境界，从而为语言学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使语言学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虽然篇章语言学家们在篇章语言学形成和发展的头 20 年间为篇章结构的描写和分析做出了贡献，但篇章语言学如何在日益加快步伐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中确定自己的作用和位置是诸多篇章研究者十分关心的问题。^① 再则，篇章语言学因其产生和形成的特殊性至今已采用了无数令人头昏目眩的定义和术语，这些也造成研究者和学习者在理解和运用上的困难和混乱。因此，不断梳理有关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并重新思考篇章语言学的对象和任务就成了当务之急。

评价一种描写篇章的理论模式能否确立并且成功，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够找出篇章的基本特点；其次要看它能否为确定这些基本特点提供方法和对具体的篇章现象有充分的解释能力；最终还要看它对培养和提高语言使用者有关篇章的意识和能力有无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下面我们按篇章语言学的发展阶段逐一介绍几种在这些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它们或曾经为篇章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或为篇章语言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1 篇章语言学的先驱：修辞学和文体学^②

篇章语言学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历史源头在西方却可

参见 Antos/Tietz 1997。

- ② 因为修辞学和文体学至今并没有被篇章语言学取而代之，所以说它们是篇章语言学的“先驱”更为确切而不是“前身”。修辞学和文体学至今仍都作为当代学科存在，与篇章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有着新的发展，并且与其他相邻学科也在诸多方面不断建立着动态联系。所以篇章语言学的先驱从发展史来看是古典修辞学。相应观点参见 Kalverkämper 2000, 1; Sanders 2000, 18—20, 23—26。

追溯到 Plato、Aristotle 时代的古典修辞学[德]Rhetorik，中译文又称演说学)和 19 世纪以后的文体学([德]Stilistik)。早在希腊罗马时期，以 Plato(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Aristotle(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Cicero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和 Quintilian(约公元 35—96)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演说学就已经着手探讨如何对篇章进行处理和加工。修辞学/演说学并不注意篇章中的某些具体现象，而是将公开的演说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修辞学/演说学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演说如何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即能够卓有成效地说服听众。因而演说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学问。西方的古典修辞学/演说学把素材和主题的处理过程分为 5 个阶段：^①

1) 确定主题[拉丁]inventio)。寻找与主题相符的思想，即内容关系到何人、何物、何时、何处、为何原因、用何方式等；

2) 编排组织[拉丁]dispositio)。将演讲按逻辑关系分成段落，每段按照以下不同的方法分工：

简短的开场白，将仲裁者的注意力引向在演讲中意欲阐明的中心议题；

- 演讲的核心部分，应该包含论证的目的、依据的事实和引证的步骤；

简明扼要的结束语，用以进一步巩固全部论述内容和要求仲裁者作出有利的裁决；

3) 演说成文[拉丁]elocutio)。挑选适合在第 1) 阶段所确定的论点的语言表达方式，尽可能使措辞准确、恰当、生动；

4) 背诵文稿([拉丁]memoria)。通过某些帮助记忆的技巧背诵演讲文稿；

5) 优化效果[拉丁]actio et pronuntiatio)。为使演说生动附加手势，并且尽量使发音标准化，使演说达到更佳的效果。

参见 Coseriu 1981 . 165—166;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0; Kalverkämper 2000, 6—7。

Heinemann/Viehweger 在评论这 5 个阶段时认为其中的第 4) 和第 5) 阶段并不很重要, 因为前 3 个阶段都体现出把篇章作为整体来处理的特点, 这已足以使古典修辞学 / 演说学具有被看作是篇章语言学先驱的资格。^① 但从我们在本书中确定的篇章语用学的视角来说, 第 4) 阶段体现出某一类篇章生产的一个阶段, 而第 5) 阶段涉及到交际活动中非言语符号和副言语符号的使用和功能, 以及演说者选用这些符号所作的考虑。对这两个阶段加以分析可以揭示篇章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因而与其余 3 个阶段同样重要。这样, 修辞学被称为篇章语言学的先驱就更是全方位地名符其实了。以上列出的 5 个阶段也充分证明, “早在两千多年前, 古典修辞学就已经指出 话语不仅有语法 即正确使用语言的规则 而且 在交际框架中, 还有具体特殊的功用。修辞学详尽阐述了在劝诱交际中有效使用话语的条件。”^② 古典修辞学 / 演说学提出了对篇章语言学富有启示的 5 个观点:

- 1) 对思想内容的形成和编排进行系统的调控;
- 2) 经过有意识的训练培养把思想转为语言表达的能力;
- 3) 篇章在如何表达思想内容的编排组织上有质量高低之分;
- 4) 篇章可以根据其对作者产生的影响被加以评判;
- 5) 篇章是有针对目标的互动行为的载体。

19 世纪以后逐渐形成并取代古典修辞学地位的文体学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 也同样十分注重:^④

- 挑选适合主题的语言表达方式;
- 挑选适合场景的语言表达方式;
- 从最终效果出发考虑如何能以最佳方式体现说话人的意图和符合交际场景的条件, 为此目标有时甚至允许违反常规。

①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1—22。

② 参见冯·戴伊克 1993, 2。

③ 参见 de Beaugrande/Dressler 1981。

④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1。

修辞学/演说学和文体学之间除了以上的共同特点外，还存在一系列不同之处。文体学的研究范围比修辞学/演说学狭窄，注意力仅限于语言手段的应用方式，不再把发音、表情、手势和形体动作作为分析对象。但是文体学却把书面语也纳入探讨的范围，首先是文学作品，然后是其他各种形式的书面篇章。这使文体学面向语言应用的特点一目了然，并因此与其他以篇章为对象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有趋同的倾向，例如亦将视线转向语言使用者的意图、素材的选择、表达的方式、交际的过程、主题的确和延展等。甚至有些篇章语言学的理论模式也把文体学当作篇章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来看待。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体学与修辞学同被视为篇章语言学的先驱，是因为它们在面对局部的单个语言单位和具体的表达方式时，是从篇章整体出发来考虑处理的方式和步骤的。

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由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三大学科组成。文字学主要研究字形，音韵学研究字音，训诂学研究字义。先秦时期，对语言的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已有一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关注语言文字现象，如荀子在《荀子》的“正名”篇中对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①到了汉代，小学独立成了“文字之学”后，产生了一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如语文学著作《尔雅》、杨雄的方言学名著《方言》、许慎的文字学名著《说文解字》、刘熙的词源学专著《释名》等。在这些从四个不同方面研究汉语语言文字的名著影响下，历代都有论著问世，但其中有关语法和修辞问题的著述却为数甚少。以后到了清代的马建忠撰写《马氏文通》之后，才逐步开展起语法和修辞的系统研究。

最先从篇章角度提出修辞问题的是齐梁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文艺理论著作。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直接动机是由于他看到当时不重内容、一味追求形式美的文坛的危机，希望通过对

^① 参见郭成韬 1998, 1.

这种作风的批判来拯救华夏文章。他在《序志》第五十对此做了如下论述：^①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由此可见，中国最早研究篇章的论著也是源于修辞学，因为修辞学必须从篇章的整体出发考虑方方面面的具体环节。

所以，对篇章的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开创于修辞学和文体学，它们以对篇章整体分析的先见之明成为中西篇章理论的前导。

1.2 不同取向的篇章观和分析方法

以往语言学各个分支和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语音、音素、语素、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并把句子看作语言之最高层次结构和最大单位，而不关心句子之间的关系，也未考虑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是什么，又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可能性。然而，由于词和句子都会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和各种交际场景中出现意义和功能的变化，这才使有些语言学家们认识到超越句子范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篇章语言学的出现为整个语言学界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篇章，为语言学研究带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并自此兴盛不衰，蓬勃发展。但篇章语言学却不像配价语法或转换生成语法等语法理论那样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它只能以所研究的对象来定义，所以篇章语言学是以篇章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同时它又被称作篇章

^①《文心雕龙》的元刊本本无标点，并有残缺部分。以上经过标注增补的引文见刘勰南朝梁/1998, 461

分析、话语分析或话语语言学。那么，究竟什么是篇章呢？对于这个问题，语言学家们至今莫衷一是，始终没能达成共识。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篇章”作出的定义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显出受局限的一面。

在回答“什么是篇章？”这个问题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书信、日记、小说、新闻报道等书面形式的文章，因为它们是篇章的典型形式，能够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但争吵是篇章吗？一段相声、一首歌词是篇章吗？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就众说纷纭了。我们在本书的阐述中将逐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篇章语言学作为一个把篇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篇章的总体范围作出界定。

1.2.1 语法取向的篇章观和分析方法

篇章的研究者们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篇章语言学与那些以句子为对象的语言系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德] Systemlinguistik）有什么样的关系。对此，大多数篇章语言学家的回答是：它们不属于篇章语言学的范围。原因是语言系统语言学把句子作为语言系统的最高层面，^①始终忽视意义、场景、心理等方面因素的作用。只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可以把语言系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看作是篇章语言学的一部分。实际上，把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篇章及其在交际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对其他层面上各种语言单位（音位、语素、词、词组、句子）研究的必要性。恰恰相反，这些探讨应该通过对篇章的研究而进一步深入和展开。然而，有关这些语言单位的分析描写并不都能纳入篇章语言学的范围，如果这些分析描写的根本宗旨不是解释篇章的性质的话。^②

因此，篇章语言学与以句子为对象的语言系统语言学既不能等

① 例如结构主义的代表之一 Bloomfield 就持这样的观点，参见 Bloomfield 1933, 170。

② 参见 Heinemann/Vieheweger 1991. 21—22。

同视之，又不能相互排斥，而应形成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应该在参照语言系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

从语言科学的总体发展来看，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句子一直被视为基本单位的原因是因为它最直观，而且稳定性比较强。即使在字、词和词组难以界定的汉语中，也可以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把标点符号作为句子的形式标准。在 20 世纪的几十年间，结构主义对句子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他非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做法实质上大同小异，都同样把句子看成是语言的最大单位，这确实为精确分析句子的结构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尤其在转换生成语法中。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开始着手分析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即便在作这样的分析时，他们也把前句看作是后句的最小语境（[德] Minimalkontext），并以此方式把对单句的描写扩至两句之间的句际关系分析，但句子作为最大语言单位的公理却纹丝未动。^①

对句际关系更多的关注始于通过观察得到的一个发现：语法上完整正确的句子未必能够独立使用和明确传递信息。如说话人只说“他捡起了它”这个句子 听话人很难知道“谁捡起了什么”只能大概明白有人捡起了某物。只有通过前言后语的补充，才能对一件事有完整的了解：

李明把手表掉落在地上。他捡起了它，小心地看看，
才又戴在手腕上。

由此可见，以句子为中心的语言学理论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们只把脱离上下文语境和交际场景的独立的句子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也丝毫没有感到有必要去考虑篇章的生产者和接受者。在这方面，Chomsky 的以下看法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如果我们希望懂得人类语言及它所赖以存在的心理职能，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问一下那是什么，而不是如何使用或为了什么目的。^② 有些语

①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3—27; Harweg 2000, 32。

② 参见布朗/尤尔 1983/1998, 24。

言学家恰恰在此看到了超越句子的界限以克服这种局限的必要性。

美国语言学家 Harris 在 1952 年发表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中第一次使用“话语”这一术语。在这篇论文中，这个术语与另一个术语“篇章”([英] text)换用。^①他提出语言并不仅仅通过词和句子来体现，而且还通过有内在联系的篇章来体现，这样的篇章可以从单句的表达直至 10 卷篇幅的巨著，从一个独白直至联合广场的公开辩论。^②所以，他认为句子只能作为篇章的组成部分来分析，美国结构主义描写句子的方法也同样可以用来描写篇章，由切分、分类和分布三种基本方法组成的分布分析([英] distributional analysis)也同样适合篇章的分析。Harris 首次尝试用形式描写方法归纳出篇章结构的基本特征，他朝此目标走出的第一步是找出一个篇章或一个篇章的各片断之间的结构成分的等值关系和类别以及它们在篇章中的分布。按照他的观点，篇章是这些不同类别的等值成分构成的序列。Harris 所做的工作可以看作是现代语言学在篇章层面对语言现象进行的初次尝试。除了他在方法上的创新，他为篇章语言学作出的更重要的贡献是把篇章确定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Harris 的创见为建立话语分析的学科奉献了一块奠基石，但他继续秉承结构主义排斥语义的传统做法使他的分析方法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因而未被广泛采用。

在这个时期着手研究篇章的语言学家都看到了将单独的句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法的理论的不足，出于弥补这种不足的考虑，纷纷提出了把研究对象范围扩展到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的愿望和要求。最先提出这一类扩展要求的研究者只是把篇章看成是跨越句子的语言单位。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中所包含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篇章的性质和特点原则上与句子相同。所以篇章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用描写句子的相同方法和相同的类别范畴来进行。这样

① 参见廖秋忠 1994, 1。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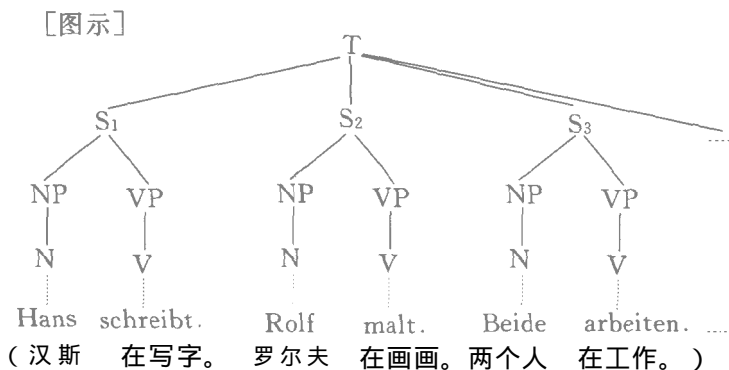
类似看法参见廖秋忠 1994, 1 黄国文 1997, 5; Harweg 2000, 29。

一来，先于篇章语言学的概念出现的是“篇章语法”（[德] Textgrammatik）的概念。篇章语法被理解为是一种相对于单句语法的多句语法，这种语法突破了单句界限，把篇章看作由句子组成的整体，并认为句子和篇章总体上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①

- 一种语言的句子和篇章的数量都是无限的；
- 句子和篇章都是反映事件的，并且有时态的特征；
- 句子和篇章都拥有内部结构，都由相关的结构成分组成；
- 句子和篇章都能够按照某些典型模式区分为数个类型，这样的模式对篇章生产和接受具有指导意义。

这些共同点无形中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能编纂一种语言的字典，却无法汇编一种语言的句典，而只能通过语法总结归纳出句子的类型和构句的规则。

语法的描写是一个抽象的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按照 Chomsky 的观点是所有语言应用的基础。60年代后半期对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最初探讨使在转换生成语法中确定下来的句子概念的绝对性受到动摇。有关研究者在生成语法的句子生成规则中增加了一条“篇章规则”，并在树形结构图中用符号 T (= Text) 来表示：



①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6。

②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7。

篇章语法理论提出的基本设想是：篇章由有内在联系的句子组合而成。因此篇章具有以下特点：^①

- 句子在篇章中以线性顺序排列；
- 篇章有左右两方的边界；
- 篇章有相对的独立完整性；
- 篇章中按序排列的句子在形式上相互衔接；
- 篇章表层结构成分之间有语义关系。

在篇章所具有的以上特征中，最重要的是被列在首位的句子的线性序列，而且由此可以作出推断，句与句之间的连接构成了解释篇章生成过程的基础和前提，篇章语法所面对的任务应该是推导出如何连句成章的“篇章规则”。然而，连句成章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关系，例如因果关系、时态关系、对立关系、提问与回答、进一步细化先行表述的内容、纠正先行表述的不当之处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但篇章语法理论的主要依据仍然是表层结构的形式。^②

篇章语法主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各种语法成分在各类篇章产生形成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能够起这种作用的语法成分被称为篇章构建手段，Heinemann/Viehweger 将它们分为两类：^③

单个独立成分	句子的总体特征
连词	语调
代词	句重音
冠词	强调和对比
代冠词	句子的语序
疑问分词和回答分词	主位—述位结构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8。

② 参见 Sowinski 1983, 35—40; Harweg 2000, 29—34。

③ 参见 Heinemann/Viehweger 1991, 28—29。

结构符号

缩略语

场景指示成分

称谓形式

表达时态和情态的动词语素

句副词

以上的篇章构建手段不仅包括连接从句的，还包括跨越多个句子或覆盖整个篇章的语法现象和语法结构。这些有关连句成章的看法是篇章语言学最初提出的基本观点，它们构成了很多研究课题的基本框架。

Harweg 的替代链理论可以看作是这个时期篇章语法的一个代表。按 Harweg 1968 年提出的见解，句子的连接是通过替代方式实现的。被替代成分[德]Substituendum) 不仅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Harweg 认为这种替代形式保证了篇章内在关联的一致性，是构成篇章的重要手段，所以他把篇章定义为一个通过持续的替代方式连为一体的语言单位的序列。^① 篇章始端的形式标记就是出现一个被替代成分的序列，即能够被篇章接受者直接理解的语言表达。如“猫”另一个形式标记是缺乏替代成分。Harweg 把所有这些替代成分连接起来的句子，如“它”，“它梅花般的脚印”；“老鼠的天敌”等，看作是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对此作出了系统和充分的描写。虽然 Harweg 归纳出的替代形式序列并不是篇章特征的全部，但他的理论在篇章语言学的发展史上一直被看作是一座里程碑。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在一个篇章里，那些相互有关联的句子的成分之间存在着衔接纽带，能以某种方式把一个词或短语连接到其他一些词或短语上。^② 这类观点的代表是 Halliday/Hasan。因此他们在 1976 年也持与 Harweg 类似的看法，即把一个前照应成分，如代词，当作回指另一个或一些词的一个形式成分来对待。^③ 但是这些观点也同样不考虑哪些篇章在生产时会受哪些条件制

① 参见 Harweg 1968。

有关篇章中的形式衔接参见胡壮麟 1994 黄国文 1997。

③ 参见布朗/尤尔 1983/1998, 25, 203—215。

约，应遵循哪些规则，更没有在自己的研究对象范围里给接受者的理解留个位置。

总的看来，语法取向的篇章语言学理论为确定篇章的某些性质作出了贡献，同时还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1) 所有的描写分析都是在语法的范围内进行的；都从同一种假设出发：篇章的性质基本上与句子相同，所以篇章语法的性质应该基本上与句法类似，并且篇章语法应是描写篇章的基本框架。已有的句子结构语法应由篇章结构语法来代替，或至少由其作为补充。篇章语法的任务是参照句法的使命制定构成篇章的普遍性规则，所有语言的任何一种篇章都应能通过这些规则被生成和解释。

2) 在描写句子之间衔接方式的基础上，篇章被理解为由句子组合成的序列，认为独立的句子之所以能组成一个篇章是因为表层结构中存在着能够形成相互衔接的共性。句法中的一些具体现象被确定为篇章结构的特征，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以上有关句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认为连句成章的一致条件应该是：

- 篇章所指保持一致，即指称同一对象。无论采用原形式的重复，还是用其他多种不同的复指形式（代词化，冠词的选用，前照应和后照应关系），表达主要内容的用词的意义应保持不变。

- 时态结构按照篇章所叙述的各个事件的时间顺序保持一致。

这些超句描写方法开辟了进入篇章领域的通道。它们同时充分显示出来的局限性在于把篇章看成是有自身结构的静止的语言单位。^① 这种观点已经在对篇幅较大的篇章进行分析时遇到困难。对话当时还被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所以更谈不上从语用的角度去进行观察和描写，假如那样的话，这些描写方法就会更显得无能

^① 这个批评主要由主张从交际角度研究篇章的语言学家提出，参见 Brinker 1997, 14—15

为力。这种描写首先将篇章脱离开交际者，篇章的功能也就因此没有得到相应的解释。这些理论只是对篇章的一部分机制进行了描写，因此它想建立篇章生成语法的预定目标很快就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因为篇章不能仅通过语法加以解释和描写。所以仅靠篇章语法是难以全面分析篇章所有现象的，在实际应用中这类方法也同样面临重重的困难。

1.2.2 语义取向的篇章观和分析方法

在以语法为基础的篇章分析方法始终在表层结构上寻找篇章的结构特征的同时，另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从语义角度探索篇章的基本结构。他们认为表层结构总是只能反映篇章的一部分意义，而决不能铺筑通往全部语义信息的路基，所以只有把语义的基本结构也纳入研究范围才能对篇章进行充分的描写。他们正确地看到，对篇章进行充分的描写要以语义基本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只有以语义基本结构为基础，那些句法衔接手段才能发挥辅助性作用，它们发送出的信息也只是对听者或读者的识别和理解提供补充性的帮助。

然而，这些理论虽然充分证明了两个相邻的句子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却忽视了所描述的事件之间，即命题（下例中用符号 p 表示）之间的联系^①

示例：

Robert Iswall möchte keine Telegramme. Er konnte sich kaum an eines mit angenehmem Inhalt erinnern. (H. Kant, Die Aula (《殿堂》))

(伊斯瓦尔不喜欢电报。因为他几乎不能回忆起有哪份电报的内容是令他欣慰的。)

p_1 : Iswall mag keine Telegramme.

参 见 Heinemann/Viehweiger 1991, 37。